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普及读物

国共合作 重庆谈判图史

主编◎周勇 潘洵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普及读物

国共合作 重庆谈判图史

主 编：周 勇 潘 洵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 / 周勇, 潘洵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29-03767-3

I. ①国... II. ①周... ②潘... III. ①国共谈判 (1945—1947) —史料 IV. 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7970 号

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

GUOGONG HEZUO CHONGQINGTANPAN TUSHI

周勇 潘洵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海龙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 × 1 030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188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67-3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

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历史已经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两党合作曾对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取得近百年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成就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政治谈判是国内外各党派、集团间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是通向和解、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在重庆,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就合作抗日中的摩擦冲突和战后和平建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和谈判,消解矛盾,弥合分歧,求同存异。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就没有国共之间第二次合作的长期坚持,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的系列谈判,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图片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了某一时间段历史的变迁。通过读解图片史中的一张张照片,人们不但能够直接获取所需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可以捕捉到比较深刻、复杂,甚至是具有时空感的历史信息。本书以图片为主,说明叙述为辅,力图通过图文并茂的表现方法,比较全面、完整地再现第二次国

共合作期间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历次谈判,除重点反映1945年8月到1945年10月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而进行的谈判外,还包括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在重庆就军事摩擦问题、边区问题等为弥合合作分歧而进行的磋商;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中共代表林彪和周恩来一道,与国民党蒋介石、张治中、何应钦等为争取时局好转而进行的较量;1944年5月到1945年上半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等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斗争。并着力挖掘过去关注不够的国共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团结抗战,追求和解与合作的不懈努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座路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国共合作重庆谈判的历史,既是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党智慧和力量斗争的充分展示,其中的斗争与合作,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今天国共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团结抗战,共御外辱	1
第二章 战时首都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37
第三章 弥合合作分歧的努力	54
第四章 争取时局好转的磋商	73
第五章 围绕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	98
第六章 为了和平民主的愿景	116
后 记	170

第一章 团结抗战,共御外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呼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在军事“剿共”的同时,也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国共之间的长期内战,开始了合作抗日的直接谈判。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的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4月5日,清明时节,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巔,国共两党派出张继、顾祝同和林伯渠等人,各自携带祭文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为此手书《祭黄帝陵文》:“尔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

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黄帝陵一直是炎黄子孙五千年血脉相承的象征。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之际，这次的共祭黄帝陵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从1937年2月至7月，蒋介石、张冲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围绕着红军改编、边区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5次谈判。

1937年7月、8月，日本先后制造“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腥风血雨中，经过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抗战地位的庐山谈话为标志，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团结抗战、共御外辱的崭新局面，从而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势的发展。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两党关系转好，政治上较为团结，军事上密切配合，一度关系比较融洽。最引人注目的是，应蒋介石的邀请，8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一行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过去10年的敌人和对手坐在一起，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国民党方面不仅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军事会议，准许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重要城市建立办事处或通讯处，在武汉、重庆发行中国共产党的刊物《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释放了一批在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而且还邀请共产党领导人参加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工作，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到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组织国民参政会，邀请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为参政员；两党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国共产党也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延安派驻联络参谋；中共军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与国民党军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抗击日军的侵略。为了进一步密切两党关系，解决某些矛盾和分歧，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陈立夫等国民党谈判代表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在武汉就共同纲领、两党合作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谈判。最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关于两党合作组织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合并两

党而不准跨党,中共则坚持其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双方只得仍然采取不成文、不固定,遇事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的问题。

一、九一八事变,中国局部抗战兴起



▲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图为柳条湖事件现场。



▲ 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 1932 年春,东北义勇军攻入沈阳,民众在小东门欢迎。



▲ 1932 年 1 月 28 日夜,日军向驻扎在上海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图为驻扎在江湾的中国军队第 19 路军奋起抵抗。

二、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 1935 年,日本侵入华北平津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